

与城共生的建筑永恒之道

——埃里克·冈纳·阿斯普隆德与皇家总理府方案解读

Eternity with Urban Symbiosis: Eric Gunnar Asplund and his Royal Chancellery Design Study

李欣 | LI Xin 解惠婷 | XIE Huiting 刘启明 | LIU Qiming 童乔慧 | TONG Qiaohui
樊芷茜 | FAN Zhiqian

中图分类号: TU-0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 (2023) 04-0054-10 DOI: 10.12285/jzs.20220425003

摘要: 本文通过具体案例回顾了 20 世纪初瑞典建筑师埃里克·冈纳·阿斯普隆德对建筑环境整体性的持续思考, 重点解析了他的未建成的作品——皇家总理府国际竞赛方案, 着重从“肌理织补”“空间渗透”“与城共生”三个方面, 分析了基于城市织补思想的设计探索。通过对传统城市肌理的延续和转化, 创造了一个由新旧建筑实体所共同定义的城市空间系统, 丰富了建筑的历史内涵, 再现了城市的空间记忆, 其设计思想充分体现了从抽象空间到具体场所的转变, 完美诠释了与城共生的建筑永恒之道。

关键词: 阿斯普隆德、皇家总理府、城市文脉、城市建筑学、共生城市

Abstract: By introducing specific cas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inking of Swedish architect Erik Gunnar Asplun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on the integrity of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 An unbuilt work, that i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schematic design of the Royal Chancellery in Stockholm, was fully introduced based on three aspects, i.e., the continuation of context, harmonious and inclusive place, and symbiotically evolutionary ci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his design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ories of urban weaving. Through exp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urban texture, he created an urban space system that is jointly defined by old and new buildings, which can enrich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 of architecture and reproduce spatial memories of the city. His design philosophy fully reflect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abstract spaces to specific places, and perfectly interpreted the eternity of architecture symbiosis with the city.

Keywords: Eric Gunnar Asplund, Royal chancellery, Urban context, Urban architecture, Urban symbiosis

作者:

李欣, 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教授, 建筑规划系主任;

解惠婷,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启明,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童乔慧 (通讯作者),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

樊芷茜,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研究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基于集成信息技术的老旧社区复合环境宜居效能机制研究, 52078388

录用日期: 2022-10

一、引言

埃里克·冈纳·阿斯普隆德 (Eric Gunnar Asplund, 1885—1940) 对 20 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建筑与设计的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 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在瑞典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弗兰姆普敦 (Kenneth Frampton) 评价他对 20 世纪建筑的贡献是开创性的, 认为如果没有他的贡献, 20 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建筑将会截然不同^①。阿斯普隆德一生设计了七十余座建筑, 其中建成作品约有四十个, 其余的则都留在了图纸上 (图 1)。他的

作品往往蕴含着一种二元性——有机与几何、古典与现代、象征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并存, 然而建筑与景观 (landscape) 的呼应是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个性的核心^[1], 这种特性不仅体现在其对自然场景的崇敬和追求, 还体现在对城市场所的重视与融合。阿斯普隆德在建筑创作过程中对建筑功能与城市发展的整体思考, 是同一时期其他现代主义建筑师较少涉及的重要议题, 体现出早期现代建筑创作对城市文脉的关注, 对阿斯普隆德建筑作品的研究是对现代建筑思想的又一次正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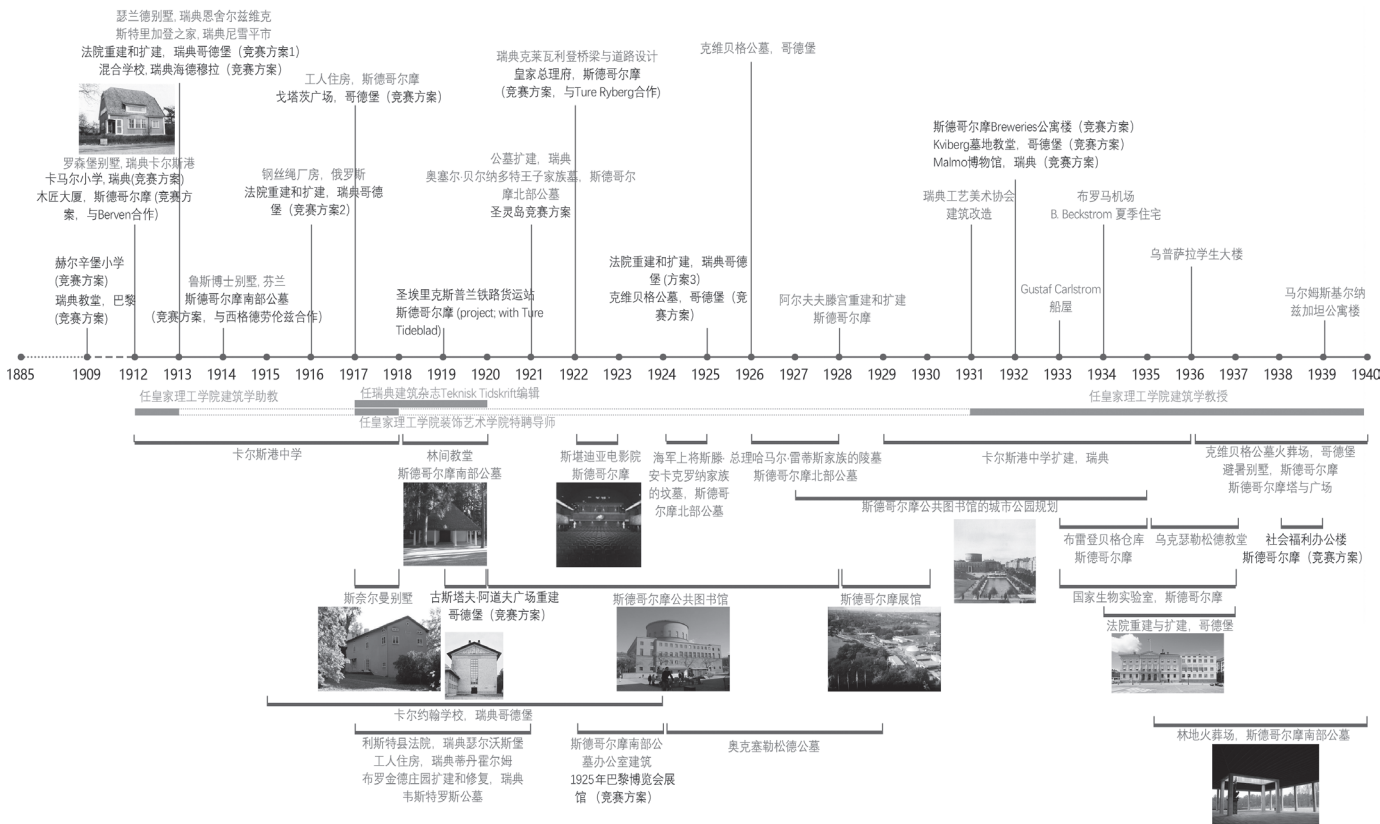


图 1: 阿斯普隆德作品时间表

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对于阿斯普隆德及其建筑思想的介绍非常有限，仅限于斯德哥尔摩公共图书馆等少数建成作品，且主要关注其浪漫主义思想的现代性演绎，而对于他在一些未建成方案中所展现出的关于城市文脉空间连结等方面的深刻思考和高超手法，却并未产生足够的重视。例如他在 1921 年参与的瑞典皇家总理府设计竞赛方案（1921—1922, Royal Chancellery Competition Project，以下简称皇家总理府），该方案虽未建成，但建筑所体现出的对包容性共生发展的深刻诠释，对新时代背景下的城市有机更新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对于当前城市发展而言，“包容、共生”也已成为受到广泛认同的重要观念。工业革命以来，产业扩张诱发的城市无序蔓延，加剧了城市空间的非连续和间断性特征。基于自由意志的现代建筑普遍缺乏共同性原则^[2]，缺乏统一性的单体建筑聚集，使得“现代城市脉络全无……如同一个得不到满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3]。建筑于城市而言，其存在的意义理应反映公众价

值，体现公共利益。正如郑时龄院士所指出：“建筑与城市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形成一个整体，构成城市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城市也为建筑提供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4]。因此，正是基于这种时代背景，城市织补等城市有机更新模式再次引起学界关注^{[5][6]}。本文希望通过阿斯普隆德的建筑思想、创作理念、代表性案例等展开较为全面的分析，发掘这位鲜为人知的瑞典建筑大师基于早期“城市织补”思想的设计实践和重要贡献，丰富相关建筑史的专项研究，对当代建筑与城市设计理论进行必要的补充和深化。

二、阿斯普隆德的建筑思想

瑞典建筑师的设计理念长期植根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情怀^[7]。不同于建筑先锋派们革命式的城市解决方案，面对工业化与新形式的盛行，阿斯普隆德始终以一种兼顾发展与包容的方式探索建筑与城市的融合，从地域性和自身传统文化中对城市文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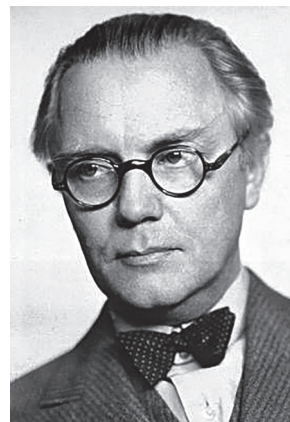


图 2: 中年阿斯普隆德

延续做出了冷静的回应与修正。尽管作为瑞典 20 世纪建筑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现代主义在瑞典的主要推动者，阿斯普隆德本人提及自己的设计理论和建筑思想的著作并不多^②（图 2）。他不同时期的竞赛和作品中表现出丰富的思想内涵，涵盖了包括建筑的精神性、直觉性、民族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象征主义、风格主义、现代主义与修正等在内的“风格”变迁，但对于建筑与景观进而扩展到建筑与城市文脉的密切关注却一直隐在

其不同时期的建筑创作之中，是其建筑思想的核心。正如肯尼斯·弗兰姆普敦所说的：“他（阿斯普隆德）在自己的实践中寻找可以超越‘风格之争’的路子，将乡土的和古典的形式融汇到一种原始的和更真实的表现形式之中”^[8]。

1. 建筑融合环境：联系自然的本能

尽管阿斯普隆德被看作“一个伟大的有创造力的个人主义者”^[9]，他对于景观与建筑的运用不能脱离北欧传统文化和瑞典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当时，处于19—20世纪之交的瑞典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也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伴随着19世纪贵族专属的景观建筑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形式，景观思想开始更广泛地与现代化进程中住房公平和生活品质问题联系起来。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民族独立意识和外来思想的共同影响下，瑞典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浪漫主义运动，在从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和新艺术运动中吸取养分的同时，拒绝对当时在北欧其他国家都影响甚大的古典主义进行简单的模仿，而是关注因大工业生产方式所带来居住品质下降的问题，重视自然的形式、使用地方材料和建造手段、注重手工艺的传承，很快形成富有瑞典本土化特色的建筑风格。阿斯普隆德的老师瓦格纳·奥斯伯格（Ragnar Östberg）就是瑞典民族浪漫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他不但将建筑视为一种融合个人喜好和特点的艺术品，而且尝试在探索建筑平面艺术构成的同时，兼顾功能、动线和场地的协调关系，这些思想对阿斯普隆德乃至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建筑发展均产生了持久而重要的影响^③。在当地，建筑呈现亲近自然、严谨简洁的鲜明特色；城市建设强调融入自然，力求使得人性与自然和谐发展、相互平衡。其核心在于反映人在自然环境中的感受、存在、与交流，建筑以多样的自然特征凸显人的中心感。民族浪漫主义运动及其展现出对瑞典本土建筑和历史的兴趣显然对年轻的阿斯普隆德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阿斯普隆德作品中联系自然景观的一种本能。

1914年阿斯普隆德与西格德·莱弗伦兹（Sigurd Lewerentz, 1885—1975）合作的斯德哥尔摩公墓方案（The Woodland Cemetery, 1914—1915）毫不掩饰对本土景观的欣赏。方案保留大量的森林空地，使用自然蜿蜒的乡间小道来组织墓园的流线，适度的建筑规模使项目具有郊区的观感，使人们联想起许多瑞典民间故事的背景，因此达到唤起旧瑞典集体记忆的一种效果。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大量公民移民美国带来的瑞典人口结构的变化，传统农村景象正在消失的焦虑在瑞典蔓延开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回应了民族主义对传统和集体记忆等基本价值观的认可，具有更为宏大的意义。由阿斯普隆德设计的伍德兰礼拜堂（woodland chapel, 1918—1920）更加鲜明地表达了他本人对于建筑与景观的态

度。虽然形式仍是基于古典的构图，但其结构被刻意隐藏起来，只剩下简洁的体量在森林中若隐若现，建筑成为仅次于自然的存在。虽然实体和空间被抽象成简洁纯粹的几何形式，但建筑与场地的整体性却能唤起丰富的情感和精神寓意（图3）。

20世纪的前30年，瑞典建筑的主流风格仍未完全跳出民族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窠臼，但对于装饰的简化和环境的重视，却具有不同于欧洲大陆古典主义的特殊魅力，自然和质朴并存。此外，“瑞典式优雅”本身也已经开始呈现出形式简化和功能主义倾向。在20世纪20年代，阿斯普隆德的建筑思想逐渐成形，地标性的斯德哥尔摩公共图书馆（The Stockholm Public Library, 1920—1928）成为他从新古典主义风格向现代主义风格转型的代表作（图4），然而往往被忽略的是阿斯普隆德进行场地规划阶段与建筑同时诞生的城市公园。利用场地自然地形通过精心策划



图3：伍德兰礼拜堂及其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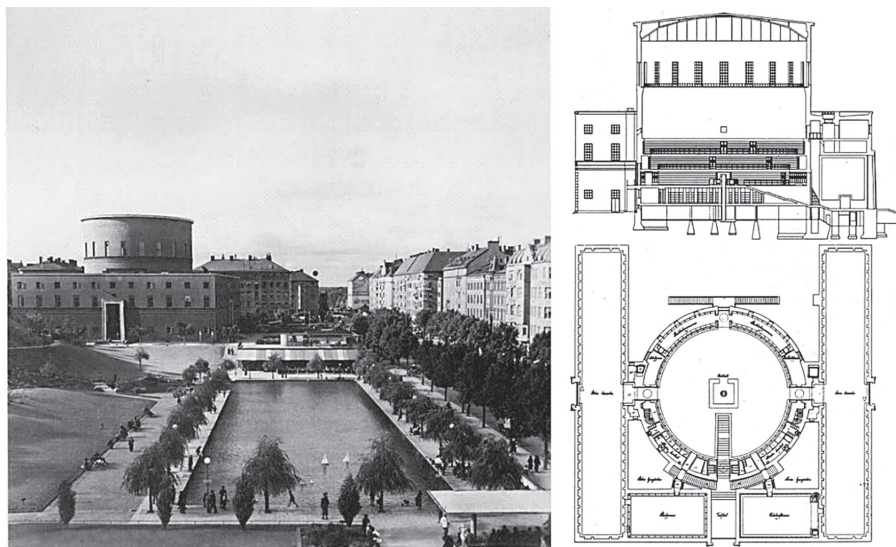


图4：斯德哥尔摩公共图书馆

的空间序列完成景观与建筑的平行并置，鲜明表达了他对于自然景观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共识。“瑞典人不应该在北美和西欧典型的的城市设计形式中寻求民族主义和公民身份。相反，他们应该在树木、露水和水体中找到它。”^④正说明了这种共识的达成。

没有卷入战争的瑞典得以在较长时间里隔离于欧洲战火的侵扰，一方面功能主义的崛起使得瑞典国内基本解决了住房极度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其自身传统在不断强化的内部联系中得以加强。这也决定了阿斯普隆德的建筑思想不同于同时期欧洲先锋派们摒弃过去的一切创造新的乌托邦方案的宣言，呈现出明显的折衷主义倾向。景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阿斯普隆德解决代表过去的民族文化与代表未来的现代化野心之间矛盾的提案。

2. 建筑潜藏城市：文脉场所的传承

20世纪末期城市的迅速扩张对环境产生不可避免的威胁和挑战，促进了学界对景观这一概念的修订。景观不再仅仅被理解为未被人类触及的自然要素，还包含了建筑师和景观建筑师在城市和乡村环境中的复杂干预。阿斯普隆德的建筑实践中早已预示了这样的转变，可以认为他对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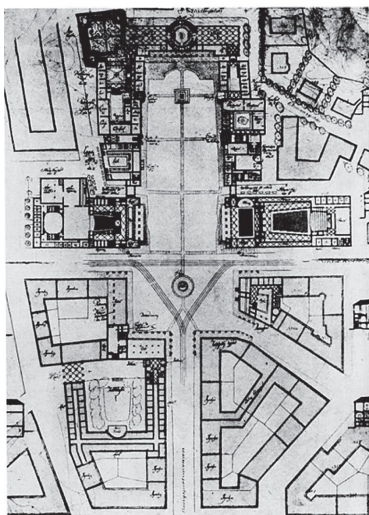
文脉的重视和城市场所的敏锐感知是早期关注景观环境的必然结果。

在1916—1923年间，阿斯普隆德参与了许多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城市大型综合体竞赛项目，积极地表达了他对于城市街区尺度、街道立面以及建筑与城市关系的深刻思考。阿斯普隆德认为街区的尺度不能以一个单一的建筑来表达，它需要在视觉上被分解成更小但统一的元素。他在哥达广场(Göta Square, 1917)的竞赛方案不同于大多数竞争者根据项目功能的需求分类而将街区设计成三到五个独立的建筑——阿斯普隆德设计了九个建筑，同时又将它们与广场两侧的街道立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和谐的整体(图5a)。该设计的核心部分，即艺术博物馆使用了具有强烈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柱廊，意在突出与侧面建筑精致的意大利古典主义的区别，作为纪念物存在于城市中。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竞赛(Gustaf Adolf Square, 1918)中他同样关注原有场地的空间尺度和立面语言，并将其自然地融合进新的建筑设计中(图5b)。他将建筑看作是现有城市的一部分潜藏其中，而局部的空间因与更大的系统相联系而具有意义，表现出城市生长的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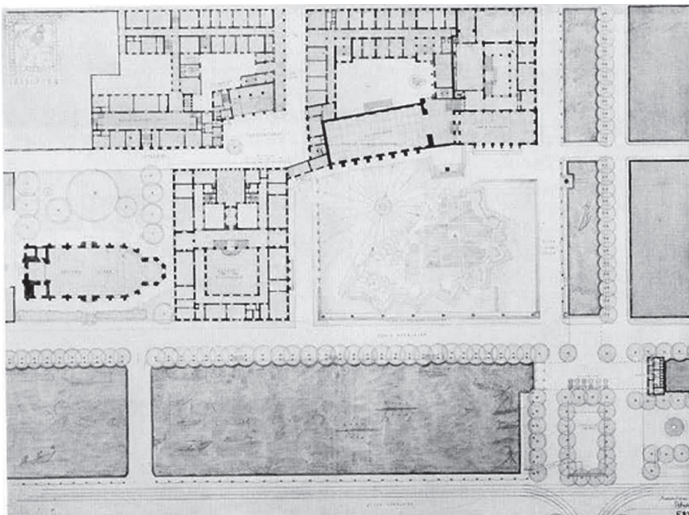
1930年，随着代表功能主义信条的斯德哥尔摩建筑展(The Stockholm

Exhibition, 1928—1930)的落地，阿斯普隆德确立了自己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地位^[10]，从高度个性化、自由的折衷主义者转型至现代主义运动的拥护者，也标志着其对于连接城市文脉空间的成熟手法得以变为现实。严谨简洁的功能盒子与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为民众展示了新生活的景象，值得注意的是，阿斯普隆德早在为巴黎国际博览会设计的建筑群中便试图展示一个更为完整的城市构成，室内外的空间通过互相联系而具有意义，形成完整的城市体验，精心设计的公园和景观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观看建筑的方式。这不同于勒·柯布西耶为此次博览会设计的新精神宫(Pavilion de L'Esprit Nouveau)，其目的则是展示标准化建设、钢筋混凝土，以及形成更大的“别墅公寓”集群的潜力。在斯德哥尔摩展览建筑群中，阿斯普隆德通过积极引入瑞典传统村落的空间体验来使人们更加接近过去的的生活。这种以场所唤起集体记忆的手法是阿斯普隆德的拿手好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文化与技术进步相矛盾的分裂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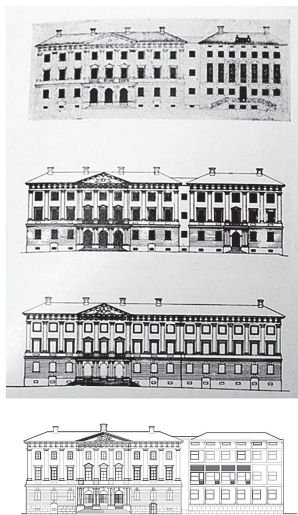
这次展览标志着现代主义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初现，然而吸引阿斯普隆德的并非仅仅是功能主义的理论基础，而是为现代建筑和新生活提供解决方案的逻辑。通过抽象的空间唤起过去的集体记忆并展



a. 哥达广场竞赛方案平面图(1917)



b. 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平面图(1915)



c. 面朝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的哥德堡法院扩建方案(从上至下分别是阿斯普隆德于1920年、1925年、1934年及1935年设计并最终建成的方案)

图5: 哥达广场竞赛方案图纸

示出对城市历史和文脉的关注，正是阿斯普隆德为现代主义建筑留下的重要遗产。1984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建筑形式研讨会上^⑤，阿斯普隆德与合作伙伴西格德·莱弗伦兹（Sigurd Lewerentz，1885—1975）的思想被作为解决后现代主义困境的药方重新回到主流学术视野。在北欧古典浪漫主义的熏陶下，阿斯普隆德与莱弗伦兹的建筑思想都表现出了抽象本质主义和物质感官主义的结合，他们的作品亦反映出对瑞典地域传统的本土化回应。然而，两者侧重点也具有一定差异，莱弗伦兹强调建筑作品本身的自主性，将古典的气氛、尺度与舒适性内化在现代主义的平面组织和建造方式之中，而阿斯普隆德则强调建筑本体与周围环境的融合，并试图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解决方案回应现代主义和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11]。

阿斯普隆德的建筑思想对许多后来的北欧建筑大师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1898—1976）将阿斯普隆德视为精神导师，阿尔托所积极倡导的人情化建筑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阿斯普隆德在建筑联系自然、象征主义等方面的影响；此外，丹麦建筑师安恩·雅各布斯（Arne Jacobsen，1902—1971）受到密友阿斯普隆德建筑思想的影响，在作品中强调建筑与周围环境的融合；约翰·伍重（Jørn Utzon，1918—）更是曾直接受教于阿斯普隆德，在其事务所学习的三年时间里，伍重逐渐获得了一种将建筑传统和场所状况相联系的自然本能，阿斯普隆德作品中平衡而克制的二元并置手法也融入到了伍重的设计之中^⑥。阿斯普隆德在参与了哥达广场和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重建等城市竞赛项目之后，已经能够较为成熟地处理建筑与城市环境的关系，通过对建筑的立面、体量的控制创造宜人且连续的城市场所。紧接着在1921年皇家总理府的竞赛中，阿斯普隆德的方案展示了超出前者的创新性和视觉吸引力。场地独特的城市肌理再一次成为方案的重要“线索”，使得皇家总理府方案在今天看来更具说服

力，体现了阿斯普隆德从新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时期对于连接城市文脉、融合场所记忆的重要探索。

三、皇家总理府设计

1. 场地简介

17世纪以前，总理府的相关办公机构设在位于东北角的瑞典王宫内（Slottet Tre Kronor），1697年因王宫建筑发生火灾，总理府逐步搬迁至附近由原皇家造币厂所改建而成的建筑中（现址），其后经过数次改建。例如，通往Mynttorget广场的标志性入口门廊（包括山墙的山花和多立克式柱式）于1790年代由皇家建筑师奥洛夫·坦佩尔曼（Olof Tempelman）和卡尔·阿德尔克兰茨（Carl Fredrik Adelcrantz）设计建造（图6）。1922年，为适应不断扩大的办公需求，斯德哥尔摩决定举行设计竞赛为总理府的扩建项目征集方案。项目选址由位于Myntgatan大道南北两侧的两块三角形场地组成（图7），其中一部分位于王宫西侧的皇家造币厂旧址，特殊的场地形态和得天独厚的周边环境使其备受关注。其中，北部的三角形场地与瑞典

帝国时代最著名的邦德宫（Bonde Palace）并肩坐落在水滨，并与圣灵岛上的瑞典议会大楼隔水相望，东侧紧靠瑞典王宫斜后方；南侧的三角形场地完整地保留了中世纪以来的城镇格局，其历史可追溯至13世纪，长屋和巷道并置排列形成了斯德哥尔摩独特的城市肌理，城内的小巷、圆石街道和建筑风貌深受北日耳曼式风格影响（图7）。在此次竞赛中，阿斯普隆德和图尔·李伯格（Ture Ryberg）组成联合团队，他们的方案采用了与其他作品截然不同的场地策略和设计构思，建筑充分回应了场地的环境要素，保持了城市空间脉络的延续性，并创造出多种尺度的城市公共空间（图7）。遗憾的是，他们的方案最终屈居第二名，并未实际建成^⑦，但方案展示出与城共生的建筑思想和连接城市文脉的高



图6：1860年代的总理府与入口门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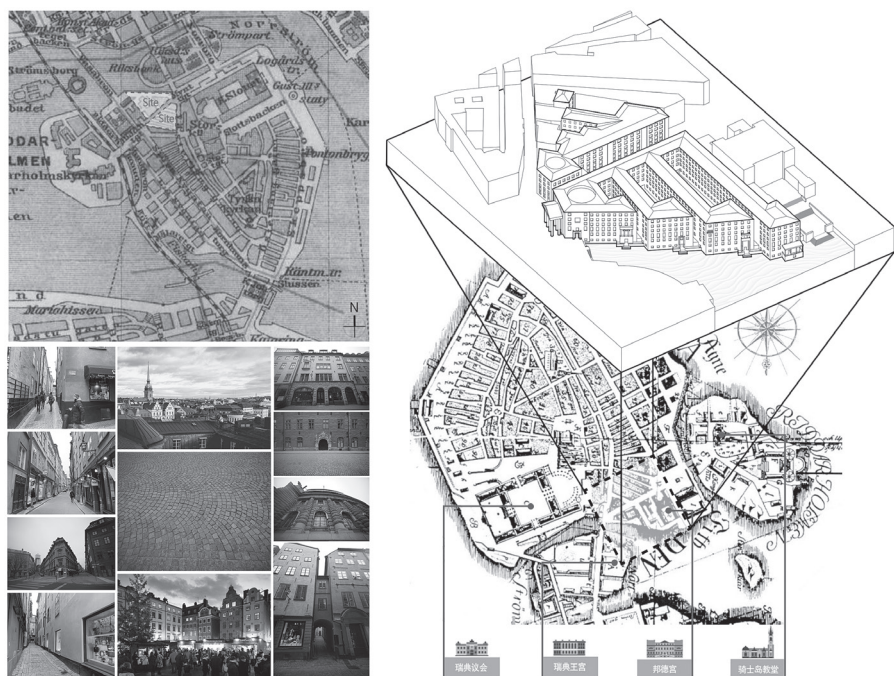


图7：斯德哥尔摩老城风貌与阿斯普隆德的皇家总理府方案

超手法对当下城市的有机更新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是由十四座岛屿组成，被誉为“北欧威尼斯”，城市中湖泊遍地、河流纵横，独特的城市肌理和地域化的建筑特征根植于瑞典王国独特丰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瑰丽悠久的建筑文化传统中。斯德哥尔摩老城（Gamla Stan）原本是为了抵御海盗侵扰而依托于梅拉伦河中的一个小岛上用巨木修建而成，因此得名“木头岛”。由于处于南北两块陆地之间，也被称为“桥间之城”（the town between the bridges），目前有大约3000人居住于此，城中遍布咖啡馆、餐馆、旅游商店、工作室、画廊和博物馆，还有包括诺贝尔奖博物馆、邮政博物馆在内的一些重要的公共建筑。公元1066年至1520年，瑞典经历了约五百年的中世纪时期，维京时代的长屋形式与后来基督时期的罗马建筑空间处理方式构成了斯德哥尔摩老城的街道和建筑模式，这种城市肌理一直延续至今（图8），对阿斯普隆德的方案创作具有重要影响。

2. 方案分析

2.1 肌理织补——提供城市扩张的方法

阿斯普隆德方案最大的特点是将隐藏于城市肌理中的形式秩序挖掘出来，并以清晰的逻辑贯穿于方案的空间组织过程。方案在平面结构上继承了原有城市肌理的密度和条形特征，保持肌理结构完整性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维护与织补，体现了对城市运行规律和日常生活需求的尊重。从类型学角度，该方案同时尝试了两种肌理织补策略——相似重构、同构共生。

对于北部场地而言，阿斯普隆德对城市肌理中狭长的房屋原型和独特的街巷空间特质进行转译，通过有意拉长中庭空间延续老城的城市肌理。从图底分析可以看到（图9），其平面布局在场地上呈现树型结构，具有清晰的主干和分支关系，并置排列的四组渐变体量清晰而自然的分隔

出三处条状外部空间，长条形柱廊和二层以上的建筑沿着 Myntgatan 大道形成城市的主要界面（图10），完整清晰地将人们熟悉的街道空间扩大为城市广场（Plaza）。此举不但巧妙地用地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切割出若干开放庭院，而且为融入更大尺度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创造了条件。这种相似型肌理织补策略是对传统城市肌理的延续与转化，积极地创造出不同的空间体验。肌理重构是对老城街区内部建筑形态的适应性调整，但从更大的尺度来看，重构街区更重要的意图是将城市发展纳入原有城市结构的脉络之中。

对于南侧场地，阿斯普隆德运用了同构共生的织补策略，对大部分历史建筑进行了保留，新增部分保持了克制，主要是对既有建筑的修补和利用，并尽可能沿着原有建筑的朝向生长，房屋之间的狭窄巷道与富有节奏感的庭院融为一体。它使隐

喻性的人类价值截面得以在物质层面存在，使一个特定地方的过去和现在共存。但这种方法不是维持现状，而是通过协调与区别新与旧的社会共识及价值取向，以适应那些在传统的城市留存下来的历史遗珠。新与旧的和合共生强烈地暗示着这一个街区未来可能的发展形势，通过将不同时期的建筑拼贴统一，使得新旧建筑在与历史原型的同构共生中产生一种积极的内在联系，让城市空间焕发出时间和记忆的魅力^[12]。世界上诸多迷人的城镇空间景观正是大量重复和平凡的普通建筑在同构共生过程中不断演进的结果，正是这种清晰而稳定的日常肌理和空间结构，才能表现出超越时间的生命力^[13]。

阿斯普隆德通过对传统城市肌理的延续和转化，丰富了新建筑的历史内涵，再现了城市的空间记忆，其设计思想是对“城市织补”（Urban Weaving）理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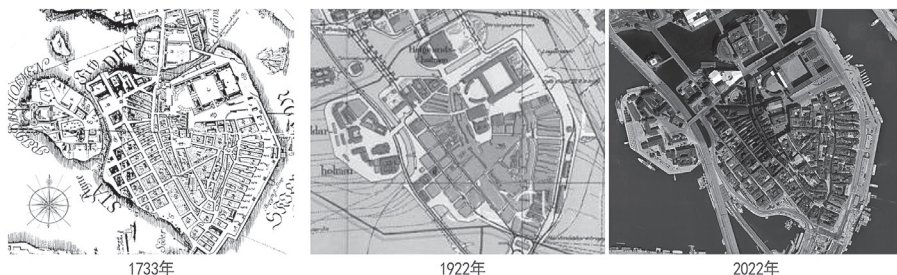


图8：不同时期的斯德哥尔摩城市肌理



图9：皇家总理府方案及周边建筑肌理

图10：方案主要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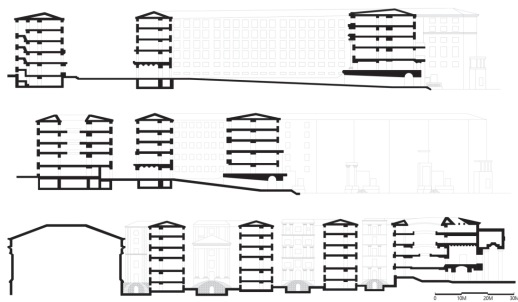


图 11: 皇家总理府竞赛方案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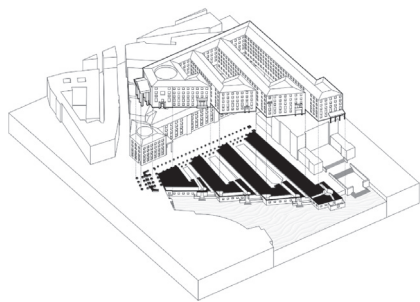


图 12: 皇家总理府竞赛方案轴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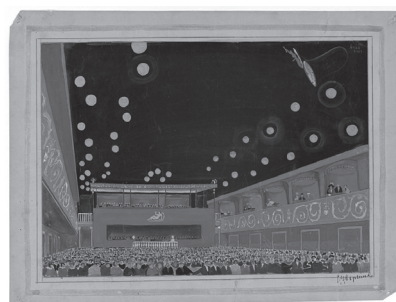


图 13: 斯堪的亚电影院设计草图

完美诠释^⑧，但却比后者更早的赋予设计实践。总结来说，城市织补强调建筑与城市之间紧密的关系，既能应用于微观场景——建筑单体，也可以用于宏观指导——城市整体更新与规划，德国许多战后城市的重建即采取了类似的思想和方法，197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在1990年东西柏林合并后，修补被肢解的城市肌理成为主要内容，保证了传统的城市肌理在外界不断侵蚀下依然能够体现出整体的稳定性，从而将内部需求的变化和外部秩序的延续相统一。

2.2 空间渗透——激发公共空间的活力

阿斯普隆德将分置于 Myntgatan 大道两侧的建筑主体共同围出一处重要的城市广场——总理府广场，很可能来自于他在意大利考察期间所受到的城市空间原型的影响，其目标就是通过广场将公众生活引入其中，利用日常性对公共建筑的抽象空间进行调和，通过这种方式试图让“处于顶峰的神殿回归日常”^[14]。与 Myntgatan 大道直接相邻的是平行街道的架空骑楼空间（图 11），或者说它本身就是街道的一部分；三条互相平行的庭院垂直向街道展开，指引人们进入到建筑的不同部分，人们可以顺中庭两侧的弧形楼梯向上到达室内标志性的圆形大厅，也可以选择沿着平缓的坡道向下穿过狭长的半室外廊道，最后到达建筑最北侧的亲水平台。在这里，原本被建筑实体分隔的开放空间通过连续的户外栈道重新组织起来，形成一组在街道、建筑、庭院、水景之间有机过渡的活动路径（图 12），体现了斯堪的纳维亚传统文化中对“建立与自然直接联系”^⑨—

以贯之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从建筑东侧的主门廊进入室内后随即到达二楼建筑主要的中庭空间便是室外（图 11），人们通过圆形的中庭空间便可直接接触阳光、雨水。这种“由外至内”（outside to inside）的体验是阿斯普隆德作品中最重要的概念，同样的将室内空间室外化的手法在同时期他的另一个作品——斯堪的亚电影院（The Skandia Cinema, 1922—1923）中则体现得更为细节，深黑蓝色天花板令人联想起星空下的音乐会，悬浮的灯笼加强室外般的

节日氛围（图 13）。这种设计中隐含的意图是“促使人们利用即时的记忆，以人为媒介从而鼓励建筑空间和自然世界之间的诗意交流”。^⑩

通过对皇家总理府的广场平面进行空间视域分析发现，此处新形成的广场拥有开阔的视野，其视域整合度等相关指标普遍高于其他区域，显示了 Myntgatan 大道在旧城空间网络中的重要联结作用（图 14）。不同尺度和性格的公共空间互相渗透，引导行人不知不觉地进入到通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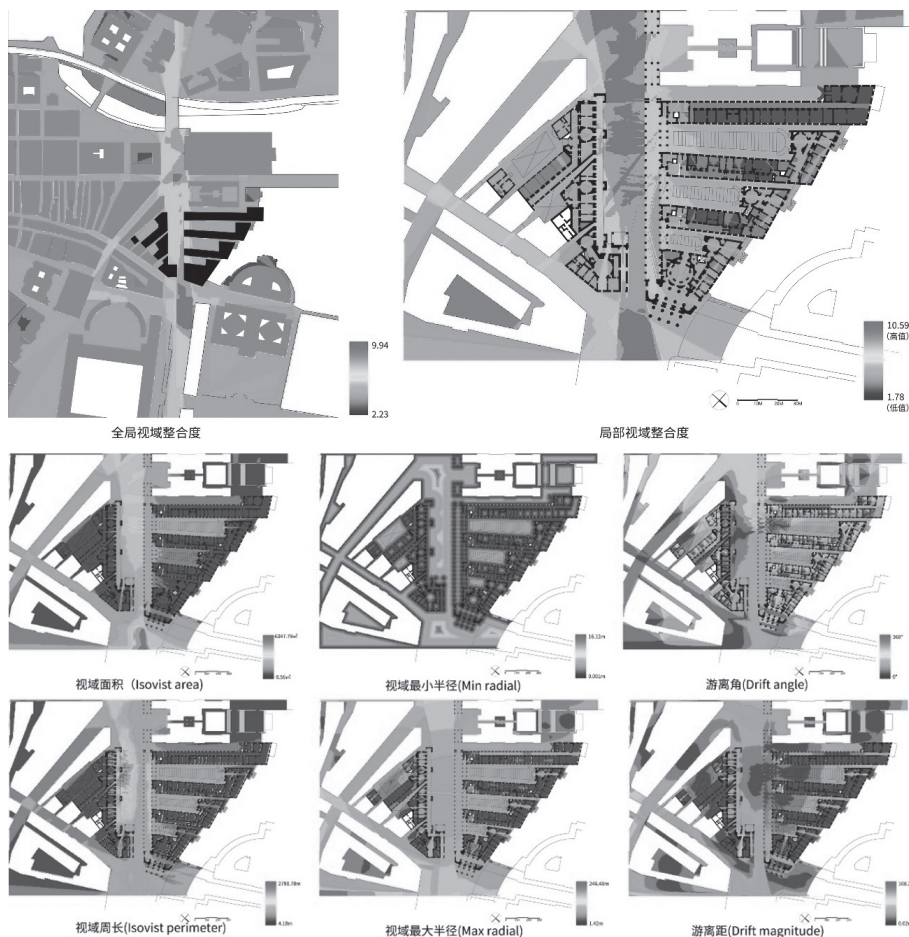


图 14: 空间视域分析

不对城市居民开放的机构建筑中来，并自由的漫游于公共空间之中。南侧的老城建筑肌理通过三条贯通巷道与广场相连，北侧“广场——柱廊——庭院”的空间组织模式将外部视线逐渐引向建筑内部，一方面延续了原有的城市意向，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各种社会性活动的发生，激发空间活力。从分析图中可以看出游离角 (Drift Angle) 和游离距 (Drift Magnitude)^⑪ 的高值区域并未集中于广场，而是分散在其周边的各个角落，表明该方案对于营造丰富的城市空间体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游离距的高值区域分布在南北两个组团的门廊及北部庭院的建筑入口处，利用视觉引导将老城的空间体验延续至建筑内部和滨水区域。阿斯普隆德将广场、通道、庭院、入口空间等要素进行组合，巧妙地将一个体量巨大的机构建筑消解于多条动线系统之中，使其更具有公共性和亲民感的同时也保持了一种迷宫般的神秘氛围，这种“双重译码”体现了建筑与城市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这种深刻的内涵可以借由“新理性主义”类型学理论加以解释，即建筑本质上是各种历史文化在生活场景中的投影，其深层结构存在于城市历史积淀的集体记忆中。这些空间原型源于建筑师对于气候环境、自然地理特征、社会文化等一系列人地关系的累积与凝聚，最终以某种极具场所感的方式锚固并呈现出来^[15]。

城市空间既是一种具体的、可视的、可操作的物质环境，又衔接着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功能活动，体现着相应的历史脉络与文化氛围，从而赋予一座城市独有的特殊性^[16]。生动而复杂的公共生活是孕育场所精神的沃土。然而，这些真实的诉求要么被所谓的前卫艺术所鄙夷，要么被简化的抽象空间所掩盖，创造了一种危险的“非人性化”^[17]，各种矛盾冲突呈现常态化趋势^[18]。建筑与场地的脱钩导致一系列城市场景的片段化和共同性价值的丧失。然而，丰富多样的日常生活终究不会按照抽象空间的教条去进行，阿斯普隆德创造了一个由轮廓清晰的新旧建筑实体所

共同定义的城市空间系统^[19]，其设计思想充分体现了从抽象空间到具体场所的转变，为建筑和城市设计提供了一个避免陷入自我封闭循环的方法，对当前的设计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3 与城共生——建筑作为城市的片段

斯德哥尔摩老城岛屿式的地理特征展现出独特的城市风貌，有限的土地资源演化出紧密的房屋肌理和细密的街巷网络，呈现向心发展的基本格局，建筑立面具有垂直生长的比例特征。由建筑立面围合出来的街道界面虽然融合着不同的色彩、材质和风格，严格的高度控制形成整齐的立面高度却使得斯德哥尔摩老城中不同时期建设的建筑和谐共生，界定出完整的街巷空间。尽管阿斯普隆德在皇家总理府方案中对视觉秩序连续性的服从主要是美学性质的，但他的构思也是“仔细研究计划的逻辑结果”^[20]。

正如亚历山大所指出的：“我们的预言总是错误的……人们使用建筑的方式不同于原来设想的方式……有必要根据实际发生在那里的真实事件随时改变建筑”^[21]。因此，对于皇家总理府这个体量巨大的公

共建筑而言，如何保证建筑在不同时期、不同方向与城市发展和其他建筑相适应成为摆在建筑师前的一道难题，阿斯普隆德以极具远见的方式展现了他的前瞻性，通过共生进化的建筑回应由于不同主体的自主意图而产生的空间调整需求，这种兼顾不同层级变化的内在进化能力使得城市整体如同有机体一样永葆活力，确保不同的建筑要素可以像细胞一样在维持整体安定的同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韧性^[22]。依据这个思想，北部场地中的四组条形办公单元依次顺着庭院向水边延伸，并在水边扭转 60 度后形成平行于水面的扩大体量，以层层叠退的方式契合三角形场地的斜边。如此一来，滨水景观既能形成连续统一的界面，又利用垂直分割的体量打破水平方向的单调性，整个建筑在临水面显示出了克制的韵律 (图 15)。从议会大厦水面往总理府方向看去，每一段建筑立面均在重复中体现出变化和节奏，将老城街道界面的空间秩序进一步延续到滨水空间，并与对岸的议会大厦毗邻呼应 (图 16)。而最长的条形办公单元将整个建筑群限定于场地西侧，并保持与邦德宫一致的长度，简洁的立面恰当地反映其作为背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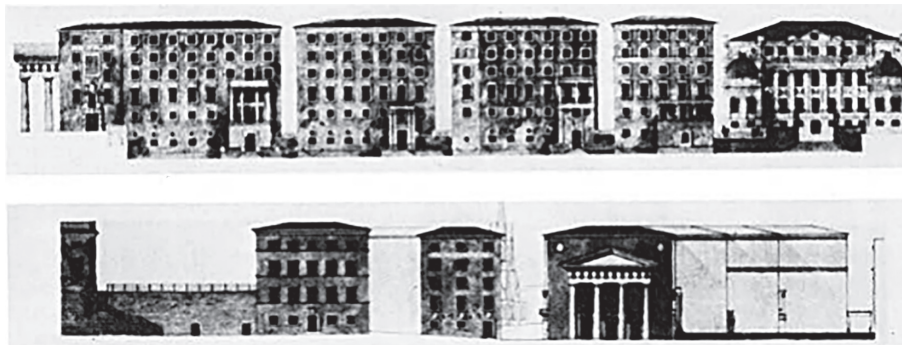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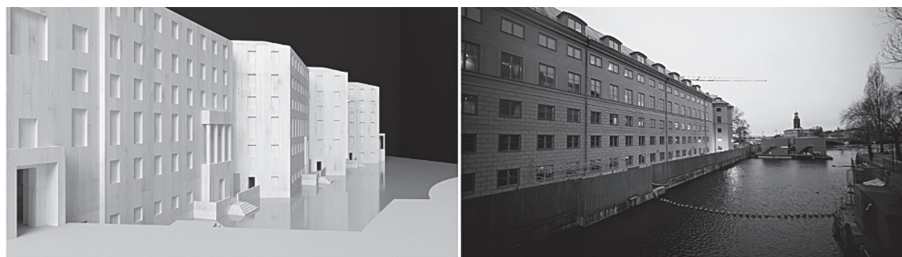


图 15：皇家总理府竞赛方案立面图 (上：临水立面，下：南立面)



a. 阿斯普隆德方案

b. 现状

图 16：从瑞典议会看向皇家总理府的滨水界面



a. 阿尔多·罗西的柏林商住楼设计草图(1992—1997)



b. 阿斯普隆德哥德堡市政厅竞赛方案(1913)

图 17: 阿尔多·罗西与阿斯普隆德方案对比

从属地位，并为将来的发展留下可操作的空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该方案在滨水立面呈现出的混杂表象给人一种分属于多个建筑的错觉——滨水平台的门楼各不相同，拼贴在比例相异的立面上。阿斯普隆德通过瓦解（fragment）单一体量赋予了城市界面新的韵律，相似的手法在他本人更早的竞赛作品哥德堡市政厅的设计中已有表现，而在半个世纪后从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 1931—1997）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代表作品柏林商住楼中仍能够追寻到一些蛛丝马迹（图 17）。这种手法背后是阿斯普隆德对于建筑与城市的深层思考，正如罗西所说“城市建筑体常常像片段那样并存于某种秩序之中；他们首先是构成而不是延续形式”。借用罗西所定义的两类分别代表共存于城市建筑中的集体性和独特性原型要素——住宅和纪念物^[23]，或许可以尝试解读皇家总理府方案在城市中的姿态。更具体地说，集体性对应着重复的住宅以整体的形式来呈现为城市肌理，而独特性以唯一性的公共建筑构成纪念物的空间标志。拉夫当（Pierre Lavedan, 1885—1982）提出，为了顺应历史，城市会保持自身的发展轴线，这种城市基本布局的历史延续则表征着城市的经久不衰——即“长久性”理论。在罗西看来，城市的“长久性”通过纪念物这种

实体展现出来，它们是带有城市过去形式的建筑，具有推动城市发展进程的要素。“这些古老的建筑物常常和现代建筑物相距遥远，有时这些建筑物长期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具有一种持续的活力。”在皇家总理府方案中，集体性以外显的方式呈现出来，不断出现的 L 形单元和变异体以重复的构型的方式产生了细腻的空间肌理；而其暗藏的独特性则以一种更为含混的负型空间姿态，表现在建筑群东侧的主门廊和入口大堂。这些特征显然与后来实际建成的方案截然不同，后者的集中体量和圆形中庭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占据场地，却又矛盾地将自己排除在城市空间的构成之外（图 18）。经久性则通过延续老城肌理与采用传统立面元素的方式呈现。广场中轴线充分尊重老城历史轴线，立面格窗窗不禁激起居民对老城意向的联想。虽然建筑在整体布局上没有完全顺应老城布局，但空间内核本质上并没有被取代，即老城街道的彼此渗透，反映出城市的历史、艺术、存在和记忆的能量。

四、结语

瑞典现代主义建筑大师阿斯普隆德立足于北欧独特的自然特征和文化背景，发展出古典浪漫主义和现代精神相结合的建筑设计思想，本文从多个角度对阿斯普隆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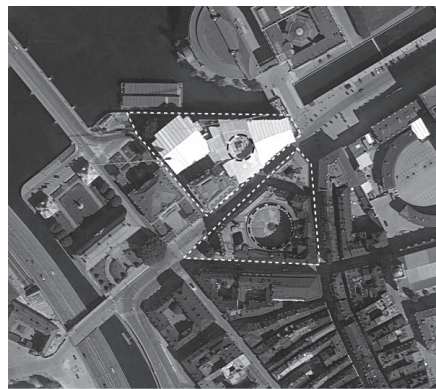


图 18: 皇家总理府场地现状

建筑思想进行了回顾，并对皇家总理府方案进行了从城市到建筑、从肌理到空间、从纪念性到日常性的深入剖析。他所设计的皇家总理府方案是 20 世纪早期运用共生、进化思想将新建筑融入城市历史风貌的重要探索，他对场地和空间的操作体现了灵感与理性的平衡，为当代城市织补理论的发展和运用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由于土地使用权、投资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很多城市在功能结构、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环境等方面顾此失彼，新旧城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片断化倾向，亟需以城市织补的方式弥合失落的空间，这不仅应体现在城市形态上尊重原有的城市肌理和城市界面、创造连续的城市场所，还应扩展到城市诸系统的优化与配合，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织补。追寻阿斯普隆德的建筑思想，能够为我国存量时代的精细化城市更新实践带来有益的启示。阿斯普隆德和他的皇家总理府设计，对城市渐进式有机更新以及城市原型空间的再创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寻找传统的空间特质并加以重构创新，以城市织补的方式营造更具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的城市面貌，或许是一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新路径。

注释

①来自参考文献[10]中的序言，原文为 His contribution to twentieth-century architecture has been at once seminal and problematic; seminal because twentieth-century architecture in Scandinavia

would have been quite different without his achievement and problematic because the polemicists and historians of the Modern Movement have experienced difficulty in classifying his work.

② 阿斯普隆德本人很少写一些关于他的设计意图的文章。他的写作主要为他在1917—1920年间担任斯德哥尔摩《建筑新志》(Arkitekture)杂志主编以及1920—1940期间在《建筑桅杆》(Byggmästaren)杂志写的短文。学者 Malcolm Woollen 认为故意模棱两可是他的目的；他希望他留下的作品不受任何特定的书面议程或教义的阻碍，而是关于个人对风景和建筑的阅读。

③ 来自参考文献 [9] 中 Kenneth Frampton 写的序言，原文为：Wrede shows how Asplund derived his own topographic approach from the catalytic lead of Ostberg's domestic planning and how this unique development was to have wide repercuss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Scandinavian architecture from the earliest essays of Ostberg to the last works of Alvar Aalto. He writes: "At the best this approach took into consideration the regulating lines of the site, the dynamics of circulation, and function, and thus came to symbolize a user-oriented accommodation and informality which eventually, via Asplund, was also to become a hallmark of the work of Alvar Aalto."

④ 原文来自乌普萨拉大学的植物学教授鲁特格·塞尔南德的专著《斯德哥尔摩自然主义》，他关注20世纪早期斯德哥尔摩的发展，以及保护城市内特殊景观的必要性，倡导一种新的城市公园能够保护这些相对原始的景观，并使它们能够进入周边地区的新住宅区。

⑤ 由加泰罗尼亚 Quaderns d'Arquitectura i Urbanisme 杂志组织，会议分析了当代欧洲建筑提供的全景以及建筑批评和理论化的状态。共有来自10个欧洲国家的15名专家参加了这些会议。其中会议《从 Asplund 到现在的斯堪的纳维亚建筑》由丹麦建筑博物馆代表和奥胡斯建筑学院教授 Nils Ole-lund 主持，试图寻找当代欧洲建筑的全球化定义，会议认为欧洲建筑的形势是由建筑师的个人主义主导的。

⑥ 来自参考文献 [7]，原文为 Eventually the work of the three masters shaped the convictions and the character of Utzon's architecture: he was able to incorporate into his own work the balanced, disciplined juxtaposition of Asplund, the imaginative gestures of Aalto, and the organic structures of Frank Lloyd Wright.

⑦ 参与竞赛的建筑师还有瑞典功能主义者保罗·赫德奎斯特 (Paul Hedqvist) 和大卫·达尔 (David Dahl)、伊萨克·古斯塔夫·克拉森 (Isak Gustaf Clason) 和沃尔特·巴克莱·加恩 (Wolter Barclay Gahn) 等人。克拉森团队的方案因兼顾实用性、文化性和美学要求，最终被评为一等奖，并于1923至1936年负责该项目的建设实施。

⑧ 国内建筑界对“城市织补”(urban weaving)的理解大多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实践建筑师约翰·波特曼 (John Portman) 所提出的“协调单元”，此概念强调以整体视角处理建筑群体和城市空间的协调性问题，其主要思路是试图借助城市综合体的建设激发城市活力，实现城市中心区的有机更新，从而带动旧城区复兴。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 通过围绕格

林威治村的一系列社会调查，进一步明确城市改造应遵循渐进发展原则，为城市织补奠定了人文维度的理论基础。随后，1967年柯林·罗 (Colin Rowe) 在《拼贴城市》一书对各种资本性因素和集团利益价值驱使下的现代主义城市建筑进行总结，强调了战后城市高度片断化的建筑环境和整体上的“去结构化”倾向，提出通过文脉主义的方式对城市空间秩序进行重建，以织补的方式将城市中被分离瓦解的城市肌理与丰富多元的城市新场景进行连接。

⑨ 阿尔瓦·阿尔托 (Alvar Aalto) 在1940年的纪念阿斯普隆德 (E. G. Asplund in Memoriam) 的论述中指出：“关于阿斯普隆德的艺术及其不同的阶段可以写很多东西，但如果研究他们，总会发现它们与自然的直接联系”。英文原文为 *Much can be written about Asplund's art and its different phases, but if one studies them one will always find this underlying direct contact with nature.*

⑩ 来自参考文献 [2]，原文为 *The preeminent concept among all those that follow, this is where one brings a significant experience of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 followed by a possibly different response to the outside.... The implied intention is to prompt one to draw upon immediate memories and encourage a poetic exchange between architectural space and the natural world.*

⑪ 游离角和游离距是反映空间引导性的视觉指标。

参考文献

- [1] Woollen M. Erik Gunnar Asplund: Landscapes and Building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 [2] 特兰西克 R. 寻找失落空间：城市设计的理论[M]. 朱子瑜等，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 [3] 柯林·罗，福瑞德·科特. 拼贴城市[M]. 童明，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59.
- [4] 郑时龄. 建筑与城市共生：城市复调音乐[J]. 建筑学报，2015 (02)：5-8.
- [5] 吴良镛. 从“有机更新”走向新的“有机秩序”：北京旧城居住区整治途径(二)[J]. 建筑学报，1991 (2)：7.
- [6] 张杰，刘岩，霍晓卫. “织补城市”思想引导下的株洲旧城更新[J]. 城市规划，2009 (01)：51-56.
- [7] 钟波涛. 北欧地域性建筑成因探究[J]. 工业建筑，2014, 44 (01)：61-64+97.
- [8]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 张钦楠，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
- [9] Emanuel, M. Contemporary Architects.[M].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0.
- [10] 蒋茂源. 莱弗伦兹与阿斯普隆德——北欧当代建筑的诗意叙事[J]. 中国住宅设施，2021 (03)：72-74+63.
- [11] Caldenby C. El nòrdic solitari. The Lonely north-erner: Sigurd Lewerentz[J]. Quaderns d'arquitectura i urbanisme, 1986: 120-143.
- [12] 何依，邓巍. 历史街区建筑肌理的原型与类型研究[J]. 城市规划，2014, 38 (08)：57-62.
- [13] 龙元. 日常的建筑与建筑的日常[J]. 时代建筑，2021 (05)：18-23.

[14] De Carlo G. Architecture's Public[M]. Johnes B, etc, ed. Architecture & Participation. London & New York: Spon Press, 2005: 5.

[15] Martin Heidegger.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M].//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1.

[16] 童明. 城市肌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J]. 城市规划学刊，2014 (03)：85-96.

[17] 尼科斯·A 萨林加罗斯. 建筑论语[M]. 吴秀浩，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180.

[18]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Donald Nicholson-Smith, translated. Oxford & Cambridge: Blackwell Ltd, 1991.

[19] 蔡永洁. 从建筑的类型到空间的类型——城市空间作为历史传承的载体[J]. 建筑遗产，2020 (03)：1-9.

[20] McDonald A. Two Urban Projects: Functionalism in the Urban American Scene[J]. 100% RAG: Syracus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tudent Newspaper, Volume 2, Number 3, 1976 (12)：7-9.

[21] 亚历山大 C. 建筑的永恒之道[M]. 赵冰，译.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367.

[22] Habraken N.J. Palladio's Children[M]. London,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05: 114.

[23] 阿尔多·罗西. 城市建筑学[M]. 黄士钧，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图片来源

- 图1：依据《Contemporary Architects》P48 作者自绘
图2：<https://www.archdaily.com>
图3、图4：Woollen M. Erik Gunnar Asplund: Landscapes and Buildings[M].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8.
图5：Woollen M. Erik Gunnar Asplund: Landscapes and Buildings[M].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8. <https://digitalmuseum.org/011034075768/asplund-gunnar-1885-1940>
<https://www.archiposition.com/items/20190226010720>
图6：<https://sv.wikipedia.org/wiki/Kanslihuset>
图7、图8：照片作者自摄，地图来源 <https://www.redbubble.com/i/ipad-case/Vintage-Map-of-Stockholm-1733-by-BravuraMedia/12618774.MNKGf>；https://discusmedia/maps/maps_of_stockholm/4728；Google Maps
图9~图12：作者重绘，原图来自 Stuart Wrede. Architecture of Eric Gunnar Asplund[M]. The MIT Press, 1980
图13：<https://digitalmuseum.org/011034075768/asplund-gunnar-1885-1940?o=0&n=2593>
图14：作者自绘
图15：Stuart Wrede. Architecture of Eric Gunnar Asplund[M]. The MIT Press, 1980.
图16：作者自绘、自摄
图17：2011年迈阿密大学 Pro. Luca Ortelli 讲座 According to Aldo Rossi: Text and Projects <https://vimeo.com/38786501>
图18：作者自绘，底图来自 Google Maps